

典範印像的追尋：介紹鮑紹霖《文明的憧憬》

梁世佑*

書名：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

作者：鮑紹霖

出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9

內容：六章，217 面

壹、前言

本文行文極為倉促，¹ 所以只能簡單介紹該書的內容，不可說是一篇完整的書評。²對於歷史學家而言，近代中國在各個層面變化或許是最令人感興趣的，³ 而扮演這一變化的主要角色，便是我們俗稱的知識份子。

各類型的知識份子採取了各種不同的方式來促進中國的「現代化」(Modernization)。大多的研究都採取了下列兩種途徑 (approach)，其一是以知識份子的「人物」思想為切入點，分析其個人的思想變化或對整個中國社會的影響；另一種則是以「政治主張／意識型態」作為區分，說明該主義／思潮在近代中國所引起的巨大變化。⁴這兩種研究方法的共同點，也是近代中國知識份子所

* 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研究生

¹ 如果讀者知道實情的話，或許會訝異不已。

² 另可以參閱蔣英豪，〈「國族典範」與「大同」理想〉，《二十一世紀》60 (2000.8)，頁 156-158。

³ 關於近代中國的定義，如果相對於「傳統中國」而言，則十六世紀葡萄牙人所帶來的科技知識便可以稱之為「近代」；如果指政治思想等變化，則十九世紀中英鴉片戰爭所帶來一連串歷史變化，才具有近代的特質。參見張存武，〈中國初期近代史要義，1511-1839〉，載《近代中國初期歷史研討會論文集》(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 474。

⁴ 此兩者的例子都相當的多，前者如李澤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台北：風雲，1990)以康有為、譚嗣同、嚴復、孫中山等人思想為經，分析近代中國思想為緯；又如 Hao Chang (張灝) 的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7) 一書分為四章分別討論康有為、章炳麟、劉師培等人的思想來觀察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危機；其他如專書研究王韜、梁啟超、胡適之著作亦可被歸類於此類之中。後者則是以自由主義、馬克斯主義、革命改革為名的著作，例如張玉法的《清季的立憲團體》、《清季的革命團體》(南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專刊 28/32, 1971/1975)，以政治團體為基礎分析政治思想，或是如金觀

關心的相同目標：「中國應該往何處去／應變成如何？」採取思想或是人物的切入點，鮑紹霖所著的《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尋》（1999）關心到一個有趣多變的問題。他指出近代中國的知識份子發動許多改革與變法來使中國「現代化」，而他們的思想中心是來自於西方的某一個典範。簡而言之，便是西方國家的「現狀」投射到他們的心中，形成了一種稜鏡（prism），知識份子心中所理解的西方列強形象，成為他們改革的中心形象，要變化中國未來的基本模型。

事實上，是西方各國在這幾個世紀以來的各自經驗。也就是說，西方各個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與不同歷史發展，造成了不同的「族國典範」。而這各種不同的「典範」全部被不同知識份子引用進入中國，產生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交流」。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的「民族」形象，也成為他們認為中國應該有的「民族形象」。而不同國家的「民族形象」反而使中國陷入模仿與混亂的危機中。

貳、內容介紹

第一章作者討論到先進國家「民族典範」對於其他國家的影響。作者引用西方學者的話說「在過去，歐洲人每每因為自己的需要而模塑中國的形象。而且，歐人對中國的印象常常轉變，所反映的正是歐洲人本身的思想或歷史情勢的改變多於中國的真正的變更。」（頁 16）事實上，大多人都是把只看到需要的那一面，而忽視其他層面的影響，這種東方主義式（orientalism）的解釋，使得真實並不容易呈現。對於中國知識份子，對西方列強的誤解將更為嚴重，因為有「救亡」的壓力。所以可能隨處找立即可用的典範。又為了打動群眾，所使用的詞彙難免誇張，而真實性則相當不足。這可能產生「兩極激化」（Polarization）的現象。換言之，可能受到本身思想改變的影響，對某國的印象評價前後極端差異。（頁 18）

在第二章〈開明帝制：俄國對中國維新志士的啓示〉中討論了「俄國」的這個典範。作者指出：大多的學者都注意到康有為的託古改制，如著名的蕭公權的《康有為思想研究》也著重於康有為本身的哲學系統。但卻沒有注意到康有為的模仿西方。康有為並沒有拘泥於學習強國的民族典範，他以實用為最高原則。他

濤、劉青峰的《中國現代思想的起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以超穩定結構理論來闡述中國的現代化思想；陳儀深的《近代中國政治思潮》（板橋：稻鄉，1997）則以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社會主義為篇章來分析。當然，筆者並不是認為此兩種是可以完全區分開來的，因為研究某一主義時，仍然會牽涉到人物部分，而人物也和其思想型態不脫關係，所以筆者只是指出有兩種切入途徑而已。

推薦的是日本與俄國，尤其是彼得大帝。最主要的理由是俄國也是一個歷史悠久而沒落的大國而能變法圖強，擠身列強之一，這正是中國的最佳典範。（頁 31-37）而彼得大帝的身世與過程，也與光緒相似，所以康有為希望光緒能夠學習彼得大帝擺脫慈禧的控制而變法圖強。（頁 42-54）但是作者指出光緒與彼得大帝在環境與時代背景上有許多的差異。另外，彼得與光緒仍有決定性的不同：彼得親政時已無外力阻礙，而光緒一生都在慈禧之掌握中。故，康有為的這個「典範」並不適合，導致康有為的變法無法成功。

第三章〈富國強兵：大英帝國對改革派的啓示〉以梁啓超作為中心的論述角色，當然，梁啓超在此時的地位與背景，做為解釋英國、法國典範之間的人物是最適合不過的。作者首先介紹當時影響日本的西方書籍，其中影響力最大的是博克爾（Henry Thomas Buckle, 1821-1862）的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英國開化史》和基佐（Francois P. B. Guizot）的《自羅馬帝國滅亡至法國革命期間的歐洲文明通史》（以《西洋開化史》為名出版）。這兩本書都具有進步的線性史觀，作者認為梁啓超之所以選擇英國作為改革的典範，與此兩本書有密切的關係。而所有的民族性中，博克爾認為「獨立自由」是最重要的。這與梁啓超的《自由書》、《新民說》強調以英國民族性格為榜樣，改善中華民族的國民性是一致的。其他如魯迅、陳獨秀等均有相同之見解。（頁 81）作者認為英國的保守與富強給個維新派啓示。梁啓超以英國政治傳統及改革為中國政治藍本，是和他的《新民說》以「英格魯薩克遜」民族為改造中華民族的藍本一樣，都是配合整個救亡及「富國強兵」為主要目的的綜合倡議。總的說起來，梁啓超希望中國能較開放及民主，因為他相信這樣的政體會使國人比較有活力。（頁 88）和其他日本知識份子一樣，梁啓超也有被外國侵略的危機感，所以他也採取英國的改革，特別是和平的從君主統治的傳統轉向民主統治，所以，他引孟德斯鳩的話說英國的憲政改革是最容易踏向文明的模式。另外，我們必須注意的是，梁啓超是康有為的弟子，而且，他所處的環境（日本）不是就是如此嗎？天皇保留下來且變成強國。梁啓超的《新民說》是以學習英國為榜樣的，以振作「國民性」、「國民性格」，⁵如果把梁啓超的《新民》和博克爾、基佐、史邁爾斯的《自助論》、福澤諭吉的「獨立自尊」對照的話，則梁啓超的新民非常明顯了。（頁 88-90）

但是，緩慢的改革趕不上「快速而明顯的革命變化」。當日本的文明志士開始感受到日本當局的保守性，進而發生許多壓制改革的舉動時，知識份子的民族典範自然而然轉向法國。而法國的熱情、革命典範很快的吸引了新一代渴望改革的知識份子。

⁵ 最早提出國民性、民德、民智的是嚴復

在第五章〈火鳥重生：德國與民國政治文化〉中，作者指出德國的中央集權與政治制度、強大的軍備成爲國民黨政府與各地軍閥效法的對象。在一次戰後，德國的一切成爲民國初年知識份子追求的對象，因爲這時候，德國代表的是一個戰敗的國家如何迅速復興的成功例子。

參、評論

本書指出英國的民主漸進改革給於維新派啓示，法國的激烈革命與文化變動則給予中國革命派啓示；德國強大的中央集權與軍備則對民國初年的政治起了示範作用。蔣百里留學德國所趕受到的國家主義的強大與威嚴。這些多樣的國家形象指導或理想化了中國的未來前景，反而產生了複雜的交錯與矛盾，⁶ 反而使得中國的現代化充滿挫折。

在整體章節安排與架構而言而言，筆者認爲與近年來研究民族主義的一本重要著作 Liah Greenfeld 的 *Nationalism: Five Roads to Modernity* (1992) 一本有異曲同工之妙。該書指出英國、法國、俄國、德國、美國五國在邁向現代化的過程中運用了民族主義的不同方式。作者對於抽象的「民族形象」給予了明瞭的解釋，對於我們理解中國知識份子的思想與概念變化，提供了一條新的途徑。

⁶鮑紹霖《文明的憧憬：近代中國對民族與國家典範的追求》（香港：中文大學，1999）